

陳伯達等著

發展工業的

勞動政策與稅收政策

遼寧省新金融

廖東原李久新等

遼南省委宣傳部

一九四八、五、十五

422
005

F120
13

由於戰爭的勝利，城市工作已擺在極其重要的地位，我們應不斷的來研究城市工作的具體方針任務政策與方法，並尋找出建設新民主主義城市工作的規律性。

遼南已有很大的城市，城市工作顯然與農村工作不一樣，如將農村的一套硬搬到城市中去，必然會犯些不必要的錯誤。

省委對城市工作極為重視，擬在五月底前後召開城工會議，特編印此一小冊子，作為各城市工作同志收集整理材料的參考。

目 錄

發展工業的勞動政策與稅收政策

堅持職工運動的正確路線反對「左」傾冒險主義

冀中首次工業會議上總工會主任陳寶玉檢討工運

紀念「五一」迎接新任務

附

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

發展工業的勞動政策與稅收政策

陳

(一)

各解放區製造工具的工業和製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業之增加與供不應求，最難了農民解糶，新工業迅速發展的無限前途，而工業生產力的加大標誌，更特別表現在工人對於生產積極性的提高。

在解放了的地方之一方面，是工人的勞動態度發生了從所未有的變化。工人們在日寇和國民黨的壓迫下，建立了新的勞動態度。建立新的勞動態度，這是解放區工人階級新的運動，是由工人階級在經濟制度下推動生產力前進的最主要的動力。有一個城市的鐵路工人代表會，在日寇和國民黨的壓迫下，建立了新的勞動態度，列爲工會的工作綱領之一。根據一些公營工廠的資料，工人們在日寇和國民黨的壓迫下，建立了新的勞動態度，「洋工」的態度，去對付日寇和國民黨的壓迫，有時一次大小便，也可以拖之至一二個鐘頭或一個鐘頭，吃飯慢吞吞，但現在工人們說，可不能再「磨洋工」了，現在是給人民自己幹活。過去工人的生活，在日寇和國民黨的壓迫下，工人們還要這樣那樣拖上工的時間，現在一聽到笛聲，就趕快上工了。過去爲了生活而偷盜材料，或在工作中缺乏責任心而浪費材料，乃是通常的現象，現在工人們對這樣情況，已有根本的改變，如有個別偷盜的，工人們就自動去追回來。所有這些，乃是目前解放區工業生產力發展最

積極的因素。一個剛解放不久的城市，那裡鐵路工人修路的情況，可以是提高生產效率的一種典型。原來一根鐵軌要八個人抬，隨後就減為六個人，再後又減為四個人了。過去揸夾板是一個人每次揸兩塊，現在有的竟揸到二十二塊，平均是揸六塊。過去抬枕木，平均兩個人一塊，現在平均一個人一塊，最高紀錄是一個人三塊。過去修路，兩百一天修六百米，現在平均一天修一千五百米，最高達到三千零五十米，超過過去歷史上的一切紀錄。鐵路附設的鐵工廠，同樣是這種情況：過去某種鐵路器材，一天一班十二三人出五六十塊，現在最高可達到一百五十塊，平均可保持一百三四十塊；螺絲過去一個架出四五十條，現在可出七八十條。有一個紗廠，過去工作十二小時，生產一磅紗，現在工作八小時，也同樣生產一磅紗。有一個鐵工廠，現在十小時工作，比過去十二小時的工作還強。諸如此類，不能一一列舉。這是工人們政治覺悟空前提高的表現。用一切方法鞏固並繼續提高工人們的這種政治覺悟，將是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最可靠的保障。不僅是這類公營工廠是這樣；在私人資本的企業中，勞資關係處理的正確，那裡工人們的勞動態度，也同樣起了新的變化，經常有提高生產效率的新鮮事實出現。

另一方面，自由資產階級則驚羨農民解放後市場的廣闊，他們怕的是貨出不來，不怕貨賣不出去，因而對於工業經營激起了極大的興趣和熱忱。許多鐵工業的資本家，都在計劃如何擴大自己的生產事業，只因爲材料不夠供給生產工具生產而着急。一個解放不久的城市，私人棉織業即由二十多家發展到一百多家，而過去在蔣介石匪幫統治下，却由日寇佔領時代的五十家減到二十多家。自由資產階級在解放區找到了發展工業的真正出路。

目前解放區繼土地改革而已經開端的工業高漲，以及工業生產效率在各種程度上的提高，這是工業生產力向上第一步的變化，這種工業生產力向上的變化，正如土地改革後農業生產力向上的變化一樣，說明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及其必然勝利，而封建買辦與官僚資本的經濟制度，則極端腐朽及其必然死亡。

中國共產黨的工業政策，是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共產黨經濟政策的一切方面，是以保護生產和發展生產出發。離開發展生產這一個出發點的政策，將是錯誤的政策。在土地改革中，共產黨堅定地保護工商業；在職工運動中，共產黨解除殘留在工人身上的封建性的壓迫和束縛以後，堅定地反對過份提高工資及破壞生產的「左」傾冒險主義；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政府並努力對於工業發展的貸款和貨物流通等等給了便利的條件。爲着使得工業能夠不斷獲得原料而擴大生產，對於煤鐵及其他礦物的擴大採掘，也已成爲我們黨和民主政府需要重視的任務。

在消滅封建土地制度和消滅官僚資本而爲中國工業發展建立最廣大的前提，並對民族工業實行堅定的保護政策之後，對於發展工業的政策有根本意義的，概括說來，是兩個政策：一個是勞動政策，另一個是稅收政策。

第一，是關於勞動政策。這個政策主要的問題是工資問題與工會問題。

在工資問題上，過去某些老解放區有過這樣錯誤的情況，即脫離那裡的一般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忽視工廠的具體條件，因而提出過高的勞動條件，過份地提高工資，使得工人們過着特別優裕的生活，同時也就使得該項工廠因爲生產成本太貴，生產品不容易賣出，而該項工廠要擴大生產當然也就成爲不可能，有的工廠甚至因此不能以廠養廠，而在有些公營工廠（指普通工業的公營工廠）中竟至需要政府的很多財政補充，才可能使該工廠繼續開工下去。若干擁護這種辦法的同志，覺得這樣就是「保護工人利益」。這種想法或這種辦法之所以錯誤，就是因爲其結果不但不能夠發展工業，並且

不可免地使初生的或幼稚的工業陷於萎縮，或使工廠得到關門的結果。這是工人運動中一種自殺的政策。同時，這種勉強人爲的，無原則的，盲目的，即不合理的過份提高工資的方法，也不能夠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不能夠鼓勵他們對生產與節約的努力；並且會使得有些工人們起了一種錯誤的想法，使他們走上庸俗的經濟主義的道路，使他們覺得可以有生活的特權，而這也就會使得工人們與其他的社會勞動人們，特別是與農民們之間，發生生活上的互相歧視與磨擦。所以，這樣並不就是保護工人利益，相反，這是在根本上違反着工人階級利益的。所以這種政策我們不能採取。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反對上述的錯誤偏向之後，也可能發生出或已發生出另一種偏向，即忽視工資問題的正確處理能够大踏步的推進生產力向前發展，而不問生產效率是否增進，却一律把工資限定在最初的低水平線上，對於特別努力提高生產和減低成本的工作人員，沒有適當的獎勵，對於怠工和浪費材料或貪污舞弊的工人和職員，沒有適當的處分，等等。很明白：這種政策，也將損壞工人和職員們的生產積極性。還有很錯誤的，即主張技術人員與普通工人的所謂『生活平等』，而對於技術人員和職員的薪水降得過低，這當然也會損壞技術人員的生產積極性，並同樣地會反轉而影響到損壞工人們追求進步的生產積極性。當然，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中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是中國革命領導者的階級，他們是能够接受正確的政治動員，而加緊自己的生產積極性的，很多新解放了的地方，那裡工人們——特別是公營工廠的工人們的生產積極性，首先是受到政治解放的鼓舞而提高起來的。但是，這種積極性，如果沒有經常合理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來加以鞏固，只專靠政治的鼓舞，是不能繼續提高，甚至不能經常保持的。因此，必須有正確的經常能刺激工人職員生產積極性的工資政策。正確的工資政策，應該是根據當地當時的一般生活條件，以解放前的舊工資爲基礎，加以合理的與適當的調劑，並在這個基礎上，實行按件、按等、按分、按節約（減低成本）……等類的合理的與適當的累進工資制度，以及按勞動分紅等種類的累進獎勵制度。工資制度，須根據各種工業部門的具體情況，各個工廠的具體條件，由廠長負責，與工廠管理委員會及工資評定委員會商量，與工人代表及工人聯

衆商量，吸收本廠的與別廠的過去和現在的經驗，決定或採用這樣辦法，或採用那樣辦法，或對於兩樣幾樣的辦法都交錯地靈活變通採用，並由廠方與工人締結生產計劃與工資條件或獎勵辦法的具体協定，而工作的考核則都要把生產的數量與質量並重。在各工廠之間的工時與工資，應互相協議，一律達到合理的規定，但應根據各廠的具体情况，容許若干差別，不可能完全一律平等。總之，一切以對於經常能提高生產有利作爲決定的先決條件。對於技師和職員的薪水，同樣需要採用這類似的制度，在保持實際的舊薪水的基礎上，根據他們工作的新勞績，節約（減低生產成本），或新創造，而按等累進。毫無疑問，根據新舊的經驗，建立這種工資制度或獎勵制度，將極大地鼓舞工人們與職員們的生產熱忱，嚴肅職工的勞動紀律，改善工廠的勞動組織，提高生產品的數量與質量，杜絕浪費，監視偷盜與貪污舞弊，減少各種不生產的消耗，並不斷提高工人們與職員們的技術，使技術落後的趕上先進的，而先進的又求更新的進步。這是推動生產力前進極重要制度。這是鞏固和發揮工人們與職員們新的勞動態度的物質基礎。實行這種制度，使工廠的生產效率可能增加到百分之五十，百分之百，以至比這更高，這樣，工廠的工資支出雖然比前增加，可是生產收入的增加却比工資的增加要大的很多，以至前途是難於計量。有些同志不善於作這種發展生產的企業計算，受陳舊的八股式工作所束縛，看不見生產力發展的前途，害怕在公營工廠中建立這樣的制度這是完全錯誤的。有的同志覺得實行這種制度會鼓勵工人們的「僱傭觀念」這也是很錯誤的。不要忘記：我們現在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還讓自由資本主義發展，而不是已實現了共產主義社會，要消滅工人們的僱傭觀念是不可能的，在實際上這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一種反動的幻想。在按件工資等類制度下，工人們因爲進行更多的生產而得到更多的報酬——或者說是因爲求得更多的報酬而進行更多的生產——的「僱傭觀念」，並沒有害處，而且是合理的，進步的。工人們取得更多的報酬，是由於出了更多的勞力與能力，一方面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前進，另一方面，可能以更多的，生產成本更低的，即比較廉價的工業品供給農民，這樣，也就能够被農民和一切的社會勞動份子認爲合理，或也就可以更加強工人和農民及

一切社會勞動分子之間的團結。誠然，實行這種工資制度，是有困難的，因為這種制度需要精確的監督檢查與計算。但是，這種困難，是容易經過群衆的評定來克服的。這種工資制度或獎勵制度，必須建立在可能的與群衆自願的基礎上。這種工資制度或獎勵制度，將代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利益，也代表工人群衆的個人和全體的利益，所以，就容易激起並得經常保持工人群衆生產與節約的競賽的自覺熱潮，並容易由群衆自己來建立一種群衆互相監督，互相檢查，互相評定的制度，使那些積極工作，善於節約，愛護公物的工人、技術和職員，獲得應有的獎勵，而使那些怠工，浪費物資，偷盜貪污的人受到應有的處罰。

這種刺激生產的工資制度與獎勵制度，在私人資本的工廠中，已有很多採取的，積了不少的經驗，在經營上獲得很多利益，今後同樣地應該鼓勵（但不得強迫）他們合理地自由採用，而公營工廠應當向他們學習已經有了的這種許多不同的合理的很有用的經驗。

關於勞動政策中的又一重要問題，即工資問題，在解放區也提出了完全新的問題。解放區的職工運動和工會工作，應該在上述工人們建立新的勞動態度的正確口號下，鼓勵工人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公私工廠的工人與廠方（公營工廠是廠長、經理及工廠管理委員會，私營工廠是私人資本家及經理等）共同商量縮短生產計劃與工資的協定，並經常集中生產的經驗教育工人，把我們的工會變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生產的學校。同時，在各工廠創辦為工人謀福利的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應當具有消費與生產的雙重性質：一方面，供給工人消費品，使工人們的工資不受或少受市場上物價波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幫助工人解決家庭生產的困難，使工人得以安心工作。現在由於物價經常波動，使規定工人工資發生困難，有些工廠按每月米、煤、布等實物價格來規定工資，不過這是非常繁雜的，工人也要受些損失，工人合作社如能擔負供給工人必需品的任務，在一定時期內不變動各種物價，即在一定數量上配給工人各種必需的實物，則可使工資在一定時期內不致變動。工人也不受損失。比較固定價格的實物配給制，是戰時比較能保護工人利益的。這須要政府、工會與合作社的一致努力，才能很好

的實行，工會與合作社就應用大力來辦到這一點。應該說，我們許多在工會工作中的同志，對於這些事情，是還不熟悉的。但一切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三)

第二，關於稅收政策。

我們黨的綱領是保護工商業，但工業比起商業來，工業又是最基本的。工業生產社會的財富，而商業（指正當的商業）只是轉商品流通的職能，是在一定社會中發展生產所不可缺少的一種經濟活動，故必須保護商業，使其能够順利地盡其一定社會的合理的職能。但商業並不生產社會的財富。曾在某一個座談會上，有些工業資本家提出工業與商業的稅收，應該有些區別，工業稅比商業稅更需要從輕，以便促進生產的發展。顯然，這種要求是合理的，應該成為解放區稅收政策的原則之一。這是工商業稅的第一個原則。同時，在那個座談會上，又共同同意：在工業各部門之中，對於製造生產工具及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業稅，也應該與製造奢侈品及非必需品的工業稅有區別，即製造生產工具及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業稅，又需要從輕，顯然，這種意見也是合理的。這是工商業稅的第二個原則。工商業稅的第三個原則，就是單一稅去代替國民黨暴政時代五花八門的苛捐雜稅。這些工業稅的原則，乃是從保護工業的生產出發，從保護工業發展的正確方向出發，並保障那一切製造生產工具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業有不斷擴大再生產的可能性。把這些原則變成實際，會有不少複雜的問題，而我們過去對這類的經驗又很缺乏，但實際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也仍然是在善於學習。正常的工商業所得稅，在解放初期或目前的條件下，實行起來，當然還有些困難，各地方斟酌具體情況，是可以採取一些過渡的辦法的。例如，在上述的那個座談會上，我們同志曾經和那些工業資本家商量出工商稅一種過渡的辦法：即由政府稅收機關根據當地各種行業的廠號、資本、營業

等等具體情況，擬出一定期間（比如半年或一年）的該業稅收數字，並和該業資本家商議此項數目是否適當，即由該業資本家共同擔負下來，然後在該同業內逕由各廠號民主討論，自報公議，按能力公平分配負擔，先營業，後納稅，而在這個負擔的期間內，除交納這個數目外，不問該工廠的生產如何擴大，不再加稅。參加座談會的工業資本家，一致歡迎這種過渡的辦法，他們覺得這種辦法好辦，而更重要的，是這種過渡辦法還可促進各工廠擴大生產或改善生產技術的自由競爭，交納多少又是經過大家公議，同業之間彼此都很熟悉，很難自作作弊，可說是公私兩利。在還不能順利實行正常的工商業所得稅之前，各地實行類似這種對於發展生產有利無害的過渡的稅收辦法，是很有必要的，而在試行的初期，因為經驗還缺乏，同時，對於投資和經營的新鼓勵，稅收的數目是應該以定得比較低些為適宜。

(四)

由於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我們將解放更多更大的城市，以及土地改革後工商業的發展，處理工商業的具體政策問題，已成為我們黨日常須要注意的議事日程。經常集中經驗與群眾意見，定出方法，修正錯誤，這就能夠保證我們正確地執行毛澤東同志的理論與政策。

★新華社社論★

堅持職工運動的正確路

線反對「左」傾冒險主義

紀念「二七」廿五週年

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偉大的反對帝國主義走狗軍閥的罷工運動——京漢鐵路（即平漢鐵路）大罷工，到現在已經整整的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來，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年年紀念二月七日這個意義重大的日子，因為京漢鐵路大罷工，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和組織性，顯示了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的先進階級，最革命的階級。

二十五年過去了，「二七」烈士施洋、林祥謙等同志所遺下的事業，將要完成，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將要在全中國被掃除，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其他愛國份子的民主政權，已經在一萬萬六千萬人口的解放區中建立起來，並將要在全國建立起來。「二七」烈士的光榮業績，是永垂不朽的。

京漢鐵路大罷工，在我國革命的職工運動歷史中，是光榮的一頁。現在的情況是我國的一部份大城市、鐵路、礦山已經解放了，更多的大城市、鐵路、礦山將被解放；另一方面，各解放區首先是東北

解放區，工業和鐵路的建設，已在積極進行。此種建設，在今後必須更大規模地進行，因此，解放區職工運動將被提到更為重要的地位。職工運動的方針是否正確，對於革命戰爭的發展和新民主主義建設的發展，必將發生更加巨大的影響，我們願趁着紀念「二七」二十五週年的機會，對於解放區職工運動的方針加以說明。

解放區的革命的職工運動與蔣管區的革命的職工運動，有同一的總目標，這個總目標，就是爭取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壓迫人民的民主解放，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但是在同一的總目標之下，革命的職工運動在兩個不同地區的具体方針，則是不同的，在許多方面，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這是因為在這兩個不同的地區裡，工人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地位和和在企業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許多方面是截然相反的。

在蔣管區工人，在社會上是最低微的奴隸，他們的勞動是替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生產利潤，他們的生命被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看的像螻蛄一樣不值錢，他們沒有人權和自由，在這樣悲慘的環境中，工人階級必須爲了活命而作救死求生的鬭爭，並且爲了了解自己與解放一切被壓迫的人民起見，必須爲推翻帝國主義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而鬭爭，如像「二七」的罷工鬭爭一樣，但是在解放區工人的政治社會地位，是根本改變和截然不同了。工人與農民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其愛國份子，一樣都做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翁，工人階級被一切人民特別尊敬，因為它是先進的階級，最革命的階級。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人階級必須擁護自己與人民的民主政治，爲爭取革命戰爭的勝利，爲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起先鋒帶頭的領導作用與模範作用。

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蔣管區有官僚資本的企業和民族資本的企業，在官僚資本的企業中，工人的地位是官僚資本家的奴隸，他們救死求生的鬭爭，常常與反抗統治者的壓迫聯結起來，在民族資本的企業中，工人受到資本家的剝削，同時又與民族資本家一同受到官僚資本、蔣介石匪幫政府與帝國主義的壓迫，他們一方面爲了生活，須向資本家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爲了反

抗官僚資本及統治者的壓迫，又應與民族資本家聯合起來，進行共同鬥爭。在解放區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解放區的公營企業與合作社經營的企業中，企業的主人是解放了的人民組織起來的政權與合作社，因而在這些企業中的工人本身，就是企業的主人，這裏沒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沒有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因而沒有而且不可能有所謂「資本」與「勞方」的對立，所謂「企業主」與非企業主的對立。在解放區的私營企業中，工人有兩重地位，一是被剝削者的地位（勞方的地位），一是社會主人翁的地位，國家政權的領導者的地位，因為是被剝削者，工人在自己的日常利益上與私人資本家有矛盾，但因爲又是社會的主人翁，國家政權的領導者，工人便應該爲了自己的長遠的利益，忍受一定限度的剝削，使這些私人企業能够進行生產，並適當的發展生產，以繁榮解放區的經濟，支援前線的勝利，並使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因生產力的大大提高，而逐步地有依據地，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方向去。應當知道新民主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不同之點，就是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私人資本的企業，在生產中還是不可缺少的成份，破壞這部份企業，對於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及其國家政權，是非常不利的。正因爲如此，工人應當堅決反對那些進行怠工、進行鬧廠、進行破壞的私人資本家，同時對於願意繼續生產下去的私人資本家，則應當與之共同工作，發展生產繁榮解放區的經濟，並在這個基礎上，一方面確定保證工人的適當生活，另一方面保證私人資本家的適當利潤，這種勞資關係與在蔣管區所應進行的勞資鬥爭，是截然不同的。

從以上的基礎分析，就可以看到在蔣管區與解放區工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在企业中的地位，是怎樣的截然不同。

從此就可以明白，解放區的革命的職工運動的方針，爲什麼要與蔣管區的革命的職工運動的方針截然不同。

在蔣管區職工運動的方針，是用一切方法來保障工作，不致於餓死，使用一切方法來推翻反動政府。在解放區革命的職工運動，就沒有這些任務了，因爲在解放區工人，沒有飢餓的威脅，反動政府

早已推翻，在解放區革命的職工運動的方針，因此應當徹底改變，改變到耐心的說服工人，來實行毛主席所說的「增加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

應當向工人說明，振興工業是爭取戰爭勝利的最首要的任務，也是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最首要的任務，而破壞或降低生產，是危害解放區的，危害戰爭勝利的，危害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的，其可怕的程度，與蔣介石匪幫的「三光政策」是一樣的。

應當向工人說明，解放區的工業生產，不是由別人負責，而是由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負責的。解放區的農民，對農業生產交大量的公糧，服繁重的戰爭勤務，是盡力負責的。工人應當把工業生產的責任，同樣負擔起來。公營企業與合作社、經營的企業裏，工人對於生產擔負完全全的責任，而且在私營企業裏，工人對生產也負了大部份責任，雖然私人資本家也要負責。

應當向工人說明，工人所以受到解放區人民的尊敬，不是爲了別的原因，僅是爲了工人階級在人民中是先進的階級，最革命的階級，工人應該以自己對革命的無限忠誠與偉大貢獻，來做人民的榜樣，領導人民前進，爲了爭取革命戰爭的勝利，與新民主主義建設的成功，工人應該吃得苦做得多，應該學習許多模範工人，如趙占魁同志等的榜樣，在戰爭的情況下，不是做八小時工作，而是做十小時工作，其他勞動條件，亦不可定得太高，不可違背經濟情況所許可的限度，不可違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原則。

應當領導工人去學習管理生產，在公營企業與合作社經營的企業中，在廠長的領導下，組織工廠管理委員會，吸收工人代表參加，討論如何減輕成本，提高生產的數量和質量，如何解決與改善出購進原料製造成品與推銷成品過程中的各種複雜問題。這種管理方法，亦要在私人企業中說服私人資本家試辦。在私人企業的管理委員會中，除了討論上述問題外，並可規定私人資本家一定的利潤和工人一定的待遇，以實現勞資兩利。

毛主席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指出：「對於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份，採取過左

的錯誤政策，如像我們黨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間，所犯過的那樣（過高的勞動條件，過高的所得稅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業者，未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目標，以近視的片面的所謂勞動者福利為目標）是絕對不許可的。這種錯誤如果重犯，必然要損害勞動群眾的利益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利益。」毛主席這個指示，對於解放區職工運動，是非常重要的。職工運動的領導者們，絕對不許可以近視的片面的所謂勞動者福利為目標，提出過高的勞動條件。解放區職工運動的方針，應當嚴格的符合與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這就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一切與此符合的應該發展，一切與此違背的應當改正過來。

必須指出：直到現在，中國共產黨內還有不少的黨員，不少的幹部，不少的工作人員，甚至有不少的擔負高級領導地位的領導人員，並不了解黨的工業政策與職工運動的路線，他們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他們只知道片片的狹隘的近視的所謂「工人利益」，而不能稍微看遠一點，他們忘記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時期內，實行過的那種左傾冒險主義的、工業政策與職工運動路線，曾經給予工人階級勞動人民與革命政府，以何等重大的損害，他們完全不研究一九三七年以來十一年內，中共中央歷次發佈的正確的工業政策與職工運動方針，他們固執地抵抗黨的路線，許多黨的地方領導機關，在長時期內甚至沒有正式討論與宣傳解釋過中央的路線，以致於使得工運工作同志，完全不瞭解中央的路線，他們竟達到如此麻木不仁的地步。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黨的一切地方領導機關，必須嚴肅地討論中央的路線，及全部工業政策與工運方針，堅決地糾正一切危害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及革命政府的左傾冒險主義的思想、政策與辦法，迅速地使工業建設與工人運動走入正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聚積一切力量，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統治，解放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

冀中首次工業會議上

職工會主任陳寶玉檢討工運

新華社晉察冀訊：冀中總工會主任陳寶玉，於該區首次工業會議上，對近年來冀中職工運動中的左傾冒險主義作了詳盡檢討，並提出：啓發與組織全體工人展開生產競賽運動，爲當前工運的主要任務。他指出：自日寇投降後，冀中工運由鄉村的僱工工作轉變爲城市的職工工作以來，長期存在着左傾冒險主義，四五年十月的冀中職工代表大會通過了片面的狹隘的勞動保護法，過高的規定了工資和保險辦法，對工人一點一滴的眼前利益如一件衣服，一個口罩等都十分強調，至於怎樣發展工業，啓發工人努力生產等，則很少具體指示，致使許多資方不敢大膽僱用工人和學徒。四六年三、九月兩次會議上，又片面的強調了工人眼前經濟利益，不少職工幹部認爲要搞好生產，必須提高工人工資，並狹隘的認爲只有工會或工會幹部才能代表工人利益，工會幹部一進工廠，只談工人工資和生活待遇問題，工廠生產則很少過問，形成工會與行政的不協調現象。在職工會的組織上存在着關門主義，曾提出撤換非工人出身的幹部，對手藝人帶領徒弟，小工廠的掌作，工人的師徒關係，認爲只是剝削關係，把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看做工人中的貴族階級，不讓他們加入職工會，並錯誤的把農村一套搬到生產部門來，在工人中劃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等階級，混亂了陣營，分化孤立了自己的力量，這是非常錯誤危險的行動。陳主任分析產生上述左傾冒險主義的根源，主要是工運領導者和一般幹部思想上對消滅封建，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政策沒有正確的認識，許多工運幹部對城鎮的職工工作的特